

文化治理视域下天水市乡村文化建设路径探析

时傲然, 张文政

甘肃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

收稿日期: 2023年5月14日; 录用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3年10月24日

摘要

本文运用熵值法对当前天水市乡村文化建设水平进行了评价, 天水市乡村文化建设受到主体缺位、载体同质化和传播无序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的内卷化困境, 推动主体回归、盘活载体是天水市乡村文化建设的迫切之举, 推动多元主体、介体和载体的融合是天水市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趋势, 基于此提出了拓展文化资源内涵、构建多元主体驱动体系和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等诸多举措, 以期形成独特的乡村文化记忆空间, 实现天水市乡村多维度的振兴。

关键词

文化治理, 天水市, 乡村文化建设, 乡村振兴

Analysis on the Road of Rural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Tianshui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overnance

Aoran Shi, Wenzheng Zh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Received: May 14th, 2023; accepted: Oct. 16th, 2023; published: Oct. 24th, 2023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entropy method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current level of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ianshui City. The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ianshui City is affected by the absence of the main body, the homogenization of the carrier and the disorderly dissemination of the carrier and other factors, and has a certain dilemma of entanglement. It is urgent to promote the return of the main body and revitalize the carrier for the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ianshui City. Push of the fusion of multiple subject, medium body and carrier i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ianshui rural culture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is, we proposed to expand culture resources connotation, build multivariate main drive system and encourag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

pate in, and many other measures, in order to form a unique rural cultural memory space, realize the Tianshui rural multi-dimension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Cultural Governance, Tianshui,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前言

2020 年我国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于 2021 年正式迈入了小康社会,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愈发凸显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就经济和文化而言, 文化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优秀的文化可以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内核动力支持, 反过来也可以推动经济建设更加健康有效, 形成一个合理的经济文化发展模式。随着治理思维的转变和治理能力的提高, 在乡村振兴中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针对当前天水市乡村空心化为表征的乡村凋敝问题, 治理主体需要在时空语境下对天水市乡村进行文化治理。“留得住乡愁”就是文化载体要存在、文化主体要在场、文化传播要健康有效, 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振兴县域经济, 在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循环驱动模式, 人们为了追求幸福而付出的代价绝不是历史的非生产性开支, 所以我们更应该坚定信心去进行乡村的文化建设, 实现天水市乡村的文化振兴, 从而为全面的乡村振兴提供持久的内核驱动。

2. 文化治理的内涵分析

马尔库赛指出了商品社会的本质, “重要的是交换价值, 而不是真实的价值[1]”。在以商品为表现的经济语境的冲击下, 费孝通所言的“乡土社会”[2]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转变, 以宗法群体为本位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消解, 个体对传统以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群体依赖性减弱并趋于疏离, 个体产生了一种不和谐的“跃迁”, 因此需要从文化治理的角度去探讨天水市乡村文化的振兴路径, 重塑乡村人民的价值信仰, 以期产生一种和谐的乡村图景。

文化治理是一种治理的思维, 这种治理思维强调群体中成员的共同参与, 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在这种良性互动中强化成员的价值认同, 从而在文化的时空场域中达到有效的治理。潘信林、孙奥军指明了文化治理的理论渊源和概念定位[3], 这些理论渊源赋予了文化治理多层次、多元化的丰富内涵。文化治理是治理主体通过善治教化的手段对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进行有效的治理, 其目的是为了给人一个和谐的物质和精神环境, 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 从而走向一条建设自我的光明道路, 这也是“以人为本”的终极旨归。吴理财从政治、社会和经济三张面孔的角度分析了文化治理[4], 文化治理的政治面孔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而且在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文化建设上政府必然要在场, 文化治理的社会面孔是和政治面孔密切相关的, 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 在时空场域中人的行为和地域差异是文化一词的重要意涵, 人的行为和地域差异产生了具有社会性的表征, 诸如民族、宗教和文化信仰等, 政治面孔在这些表征上体现出了相应的政治色彩。文化治理的经济面孔是从文化产业的商业角度出发的, 这面孔带有浓厚的经济色彩, 在这一面孔中, 治理主体运用文化工业的手段构筑了一个庞大的治理修辞体系。实际上这三张面孔互相配合交融在一起, 区分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文化治理的内外特

性, 为天水市乡村文化建设提供实践路径的依据。陈建基于对发达国家公共文化治理模式类型的研究, 提出了我国应该确权定责优化政府职能, 赋权增能强化社会参与, 从而实现公共文化的善治[5]。

诸多研究启示天水市乡村文化建设的治理主体应该以文化治理为导向, 对乡村人民在生存、信仰、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出现的困惑进行纾困, 解决乡村人民因不适应社会快速变迁出现的现代性症候, 这个“善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也是对文化治理中“治理”的准确阐释。

3. 天水市乡村文化建设现状及水平评价

(一) 天水市乡村文化建设现状

1、天水市区位概况

从地理位置上看, 天水市处于六盘山地、秦岭山地和黄土高原的交接地带, 是关中平原城市群次核心城市、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 其下辖的秦州区和麦积区相对地理环境较好, 并有一定的工业基础, 武山县、甘谷县等五县相对地理环境较差, 这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制约性。从文化特色上来看, 天水市下辖的五县二区各有特色, 文化资源积淀深厚, 秦州区是华人祭祖寻根的圣地, 麦积区是世界文化遗产麦积山石窟的所在地, 甘谷县有“华夏第一县”之称, 秦安县已发现仰韶、马家窑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其余三县也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从经济发展来看, 2018年天水市的生产总值为652.05亿元, 在甘肃省各市州中居第三位, 在关中平原城市群的12个城市中居第9位, 2018年秦州区、麦积区、甘谷县、秦安县、清水县和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生产总值分别为216.16亿元、187.55亿元、63.41亿元、56.11亿元、56.1亿元、44.51亿元和29.83亿元, 仅就地区生产总值来看, 其下辖的五县二区可以划分为三个梯队,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秦州区和麦积区, 发展中的甘谷县、秦安县和武山县, 发展较为落后的清水县和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2、天水市文化资源状况

天水市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以民间民族特色地域文化为基础, 以伏羲文化为龙头, 以大地湾文化、秦国早期文化、麦积山石窟文化和三国古战场文化为重点。这五大文化的发展雏形已初步具备, 但其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正向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考虑到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 结合《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对天水市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分类, 将其分为: 核心层文化资源、外围层文化资源和支撑层文化资源, 具体情况如下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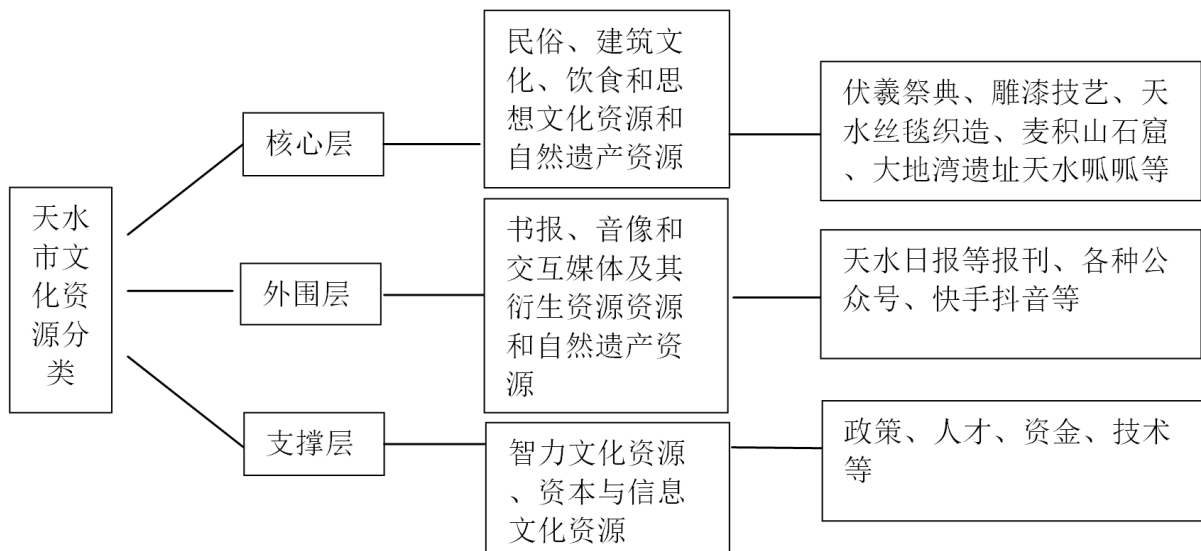


Figure 1. Classification map of cultural resources in Tianshui city
图 1. 天水市文化资源分类图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天水市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8 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50 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 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54 处, 有两个中华历史名村: 麦积区麦积镇街亭村和麦积区麦积镇胡家大庄村, 有两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兴国镇凤山村和五营镇邵店村。其具体各项数据均居甘肃省前列, 这充分说明了天水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将天水市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按县区进行分类, 具体情况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Table of representative cultural resources in Tianshui city
表 1. 天水市代表性文化资源情况表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水市	太昊伏羲祭典	伏羲庙、胡氏民居、后街清真寺、玉泉观、
秦州区	雕漆技艺、地毯织造技艺	纪信祠、放马滩墓群
麦积区		麦积山石窟
武山县	武山旋鼓舞	水帘洞、木梯寺、狼叫岔和圣寿寺
甘谷县		大像山石窟和毛家坪遗址
秦安县	秦安小曲、女娲祭典	大地湾、兴国寺、文庙大成殿
清水县	清水道教音乐	李崖遗址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张家川花儿	马家塬遗址和河峪摩崖石刻

这些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的转化是带动天水市乡村文化建设的关键, 在向文化产业过渡的进程中, 需要形成具有天水市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 例如目前发展较好的天水市汉唐麦积山艺术陶瓷有限公司。

3、天水市乡村文化建设情况

在 2011 年末到 2019 年末, 天水市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公共图书馆的数目一直都是 113 个和 8 个, 从数量上来说没有任何变化。而农家书屋的数量在 2013 年末到 2019 年末也保持了稳定, 维持在 2540 家, 仅从设施建设上来说, 天水市的乡村文化建设基本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从 2011 年末到 2015 年末, 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教育文化及娱乐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占比的五年平均水平进行比较, 天水市的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差距为 3.60%, 而在 2016~2019 年的平均水平差距为 0.23%, 趋于一个稳定的水平。从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教育方面来说, 天水市的小学生与专任教师的比例从 2011 年的 19.05 发展到 2019 年的 14.61, 这对于提高天水市乡村人民的文化素质是一个进步, 而中学毕业生人数从 2011 年的 78,054 人降到 2019 年的 70,398 人, 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的数量减少对于天水市乡村文化的建设和传承是不利的, 从事文化事业的人数从 2011 年的 3498 人提高到了 2019 年的 6681 人, 可见文化事业也在逐渐发展, 这些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是怎样影响天水市乡村文化建设的, 下文中进行客观科学的判定。

(二) 天水市乡村文化建设水平评价

考虑数据的科学性和可获得性, 选取《甘肃发展年鉴》2011 年~2019 年的相关数据, 部分数据来源于《天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天水经济年鉴》。

1、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2018~2022 年)》选取其中衡量乡村文化振兴的两个重要一级指标乡风文明和产业兴旺, 并结合其它相关研究, 分别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二级指标进行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 具体见下表 2:

Table 2. The initi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 Tianshui city
表 2. 天水市乡村文化振兴的初始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性质
乡村文化振兴乡风文明元正向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	/	
		娱乐支出	/	
		农村书屋书	个	正向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	个	正向
		普通中学毕业人数	人	正向
		小学学生和专任小学教师比	%	反向
		旅游收入	亿元	正向
	产业兴旺	文化事业人员数	人	正向

2、指标权重确定

运用熵值法对相关指标进行赋权, 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衡量, 其中熵值越小反映的信息量越大, 相应的权重也越大, 那么对应指标对天水市乡村文化的建设水平影响也越大, 这样的赋权手段对 7 个二级指标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客观的量化衡量, 有助于更好地衡量天水市 2011 年到 2019 年的乡村文化建设水平, 以及为以后的评估方法提供一定借鉴。

由于原始数据的数据量级、单位和性质等有很大差异, 故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处理。7 个二级指标中有 6 个正向的指标, 1 个负向的指标, 需要分别进行标准化的处理。另外, 为避免后面数据中出现零值和负值, 将数据整体向右平移 $a = 0.0001$ 。

$$\text{正向指标: } X'_{ij} = \frac{X_{ij} - X_{\min}}{X_{\max} - X_{\min}} + a$$

$$\text{负向指标: } X'_{ij} = \frac{X_{\max} - X_{ij}}{X_{\max} - X_{\min}} + a$$

其中, X_{ij} 是某项指标的原始数值, X_{\max} 和 X_{\min} 是某项指标在 2011 年到 2019 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X'_{ij} 是标准化处理之后的数据。

运用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分别计算第 j 个指标的比重: $P_{ij} = \frac{X'_{ij}}{\sum_{i=1}^n X'_{ij}}$, 再计算第 j 个指标的熵值:

$e_j = \frac{1}{\ln n} \sum_{i=1}^n P_{ij} \ln P_{ij}$, $0 \leq e_j \leq 1$, 从 2011 年到 2019 年共计 9 年, 故这里的 n 取值为 9, 然后计算第 j 个指标的信息效用值: $g_j = 1 - e_j$, 最后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w_j = \frac{g_j}{\sum_{i=1}^m g_j}$$

赋权后的各指标参数情况如下表 3 所示。

显而易见, 在这 7 项指标中, 文化事业人员数、普通中学毕业人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和旅游收入这四项指标对天水市乡村文化建设的影响最大, 不过由于目前的建设水平处于一个较低的量级, 这四项指标的影响只是当前相对于其他三项指标更为显著。

3、综合指数评价

$$U_c = \sum_{i=1}^n \omega_j P_{ij}$$

Table 3. Table of weights of various indicators

表 3. 各指标权重情况表

系统层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指标性质
乡村文化振兴	乡风文明	0.53		元	0.0983	正向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	/		
			娱乐支出	/	0.0416	正向
			农家书屋数	个	0.1411	正向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	个	0.1893	正向
			普通中学毕业人数	人	0.0596	反向
			小学学生和专任小学教师比	%	0.1335	正向
			旅游收入数	亿元/人	0.3365	正向
			产业兴旺	文化事业人员	0.47	

Table 4. Scores of various indicators and comprehensive indices

表 4. 各指标及综合指数得分情况

农村教育文化和娱乐支出	农家书屋数量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	普通中学毕业人数	小学师生比	旅游收入(亿元)	文化事业人员数	综合指数	
2011	0.0000	0.0044	0.0000	0.0268	0.0000	0.0000	0.0109	0.0420
2012	0.0026	0.0000	0.0000	0.0401	0.0021	0.0024	0.0016	0.0489
2013	0.0077	0.0053	0.0000	0.0777	0.0069	0.0044	0.0229	0.1250
2014	0.0047	0.0053	0.0235	0.0128	0.0084	0.0073	0.0000	0.0621
2015	0.0111	0.0053	0.0235	0.0114	0.0085	0.0116	0.0067	0.0781
2016	0.0143	0.0053	0.0235	0.0120	0.0088	0.0160	0.0292	0.1092
2017	0.0144	0.0053	0.0235	0.0074	0.0088	0.0242	0.0195	0.1032
2018	0.0203	0.0053	0.0235	0.0011	0.0088	0.0302	0.0230	0.1122
2019	0.0233	0.0053	0.0235	0.0000	0.0073	0.0374	0.2227	0.3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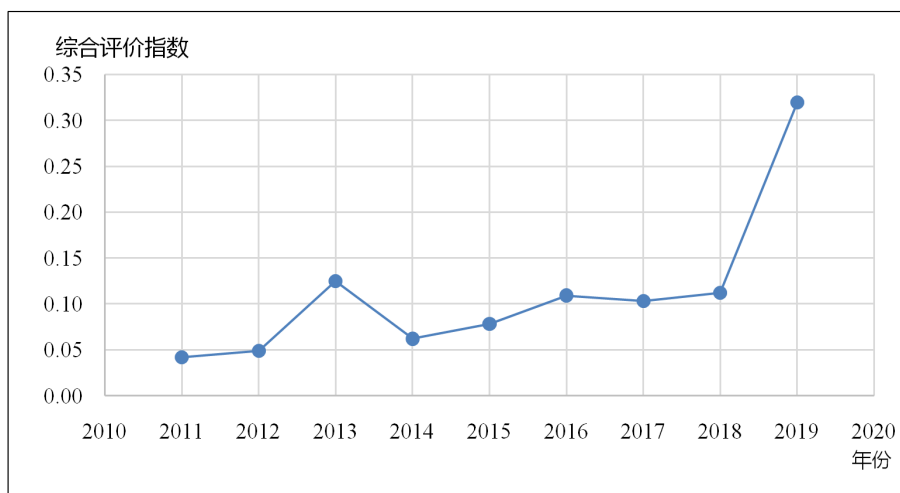


Figure 2.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chart of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ianshui City
图 2. 天水市乡村文化的综合评价指数图

U_c 是衡量天水市乡村文化建设水平的综合指数, ω_j 是各指标的权重系数, P_{ij} 是各指标的比重, 运用上述公式处理后的各项指标及综合指数得分情况如表 4, 绘制后的综合指数变化情况趋势图如图 2 所示。

可以看出, 天水市乡村文化建设水平在 2011 年到 2018 年处于缓慢发展状态, 2018 年到 2019 年出现了快速增长是因为其中的从事文化事业人数比上年增加了 81.55% 导致的, 整体来看得分情况仍然偏低, 其综合评价指数远低于 50%, 尚处于一个乡村文化建设的低水平。

4. 天水市乡村文化建设存在问题分析

(一) 乡村文化主体缺位

1、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的流失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城乡二元格局带来的发展不平衡造成乡村发展的困局。乡村的人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从乡村开始向城镇流动, 作为一个发展落后的西部城市, 天水市的农村人需要进行谋生的季节性流动。一般而言, 当地的农村人在农忙季节都会返乡收割庄稼, 但是这种因为收割庄稼的返乡行为也因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谋生原则在逐渐弱化, 更为稳固的返乡行为是具有中国情结的回家过年。整体而言, 农村的青壮年一年大部分时候都在外地谋生, 中学毕业人数的减少有一部分包含在这种流动中, 而这一客观现实造成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的缺失。从 2010 年末到 2019 年年末, 天水市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 3.14%, 天水市农村常住人口减少了 16.87%, 其变化情况如下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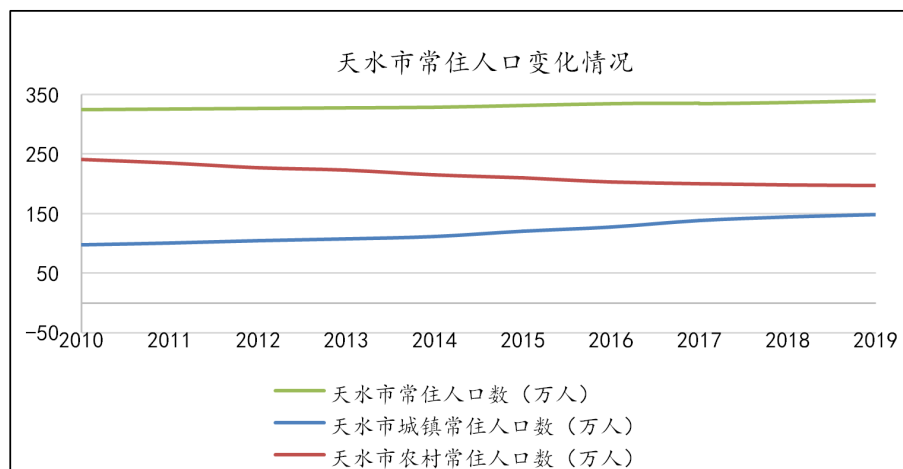


Figure 3. Trend chart of permanent population change in Tianshui city

图 3. 天水市常住人口变化趋势图

显而易见, 天水市近十年来常住总人口变化不大, 农村常住人口下降幅度较为明显, 城镇常住人口上涨较为缓慢。这些变化说明天水市乡村的人口流失严重, 天水市乡村出现了空心化的表征, 空心化有空间空心、人口空心、经济空心和社会功能空心[5], 这也是天水市乡村人口空心的具体表现。

2、乡村文化建设传承主体的断层

因为天水市乡村人口的大量流失, 所以乡村文化的传承后继乏人, 一方面, 天水市农村的精英人才在大量流失, 另一方面, 天水市的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 具体情况见下图 4, 2019 年天水市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 11%, 判定为老龄化社会, 农村的老中青三代出现明显的传承断层, 相较年轻人而言, 老年人了解并传承的天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多一些, 要是秦安小曲、张家川花儿的一些作品形式没有用媒介保存下来, 那么老年人的消亡也即意味着天水市乡村文化一种形式衍生作品的消亡, 这对于天水市乡

村文化传承和建设来说就是一种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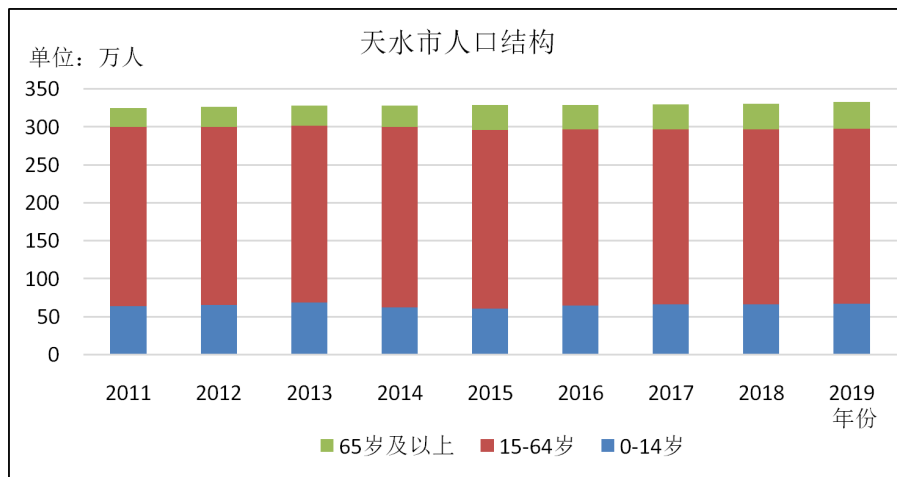


Figure 4. Population structure map of Tianshui city
图 4. 天水市人口结构图

(二) 乡村文化载体同质化

传统文化载体有书籍、广播和电视等, 现代文化载体有手机和电脑, 如今手机在农村的普及程度很高, 电脑也在逐渐传播, 并且政府在基层建立了综合文化站和农家书屋, 这些载体为承载乡村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这些文化载体在当下出现了一些问题, 从数量上来说, 天水市的文化站和农家书屋的数量从 2013 年以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从质量上来看, 传统的文化载体因为缺乏适应性和乡村特色在乡村显得曲高和寡, 文化站缺乏有效活动停留在形式层面, 农家书屋的书籍不适合当地乡村居民的阅读, 借阅人数寥寥, 而现代的文化载体因为娱乐性强化了用户的黏性, 并且在内容选择上多良莠不齐, 手机等媒介以其鲜明的特色冲击了广播电视的载体架构。

(三) 文化传播无序

当下文化传播方面呈现出的特点是各种媒介的扩散, 信息技术的引进以及社会身份认同的削弱, 整体呈现出一种无序感, 这些特点在当前天水市乡村较为普遍, 在深刻的城乡二元对立中艰难地平衡自我, 与网络在现实中达成和解, 这是大多数个体面临无序的选择。一方面是政府主导的“文化下乡”等乡建活动, 这种下乡带有扶贫的性质, 在形式和内容上没有和乡村实现良好的对接, 各种文艺活动在农村缺乏呼应, 以“文化下乡”为名的文化传播在天水市乡村显现出了无力感。布局于基层乡村政府的农家书屋鲜有人问津, 这是一种“作为他者的想象” [6]对农村的介入, 当然也没有让乡村人民真正感受到文化的审美愉悦。另一方面, 民间性的文化活动在自生自灭, 能够延续下去基本取决于文化形式和内容本身的吸引力, 民间性的文化活动大都是民俗活动, 诸如社火等节日仪式, 这些民俗活动在技术性和经济性的影响下渐趋于衰弱。近年来短视频在乡村获得了普遍性的欢迎, 例如“快手”等短视频平台, 不过其传播的内容缺乏区分, 大多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内容, 相关平台监管不力, 对内容的审核等方面工作不力或者完全缺位, 导致出现了许多农民用各种手段争当“网红”的现象, 这些现象不利于建设和谐的新农村。

5. 天水市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建议

文化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并且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扬弃”是需要治理主体拥有一定智慧的, 应该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和执行体系。肖莉和王仕民运用现代性和后现代的双重视角来审视乡村文

化的振兴路径[7], 结合天水市乡村文化建设来看, 现代性视角启示治理主体应该科学审慎地对待乡村文化的建设, 后现代视角启示政府、农民、非政府组织重塑文化建设的秩序, 形成合理的驱动体系。

(一) 乡村文化资源的聚合与再生产

1、拓展文化资源的内涵

天水市文化资源丰富, 这种丰富的维度指向于历史遗存, 诸如文物、民俗、风俗和历史等。以天水市的伏羲文化为例, 其最为人所知的是天水市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 政府主导下的伏羲祭祀大典为扩大城市知名度以及带动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伏羲文化为天水市带来的文化效应和经济效应还是较弱的, 没有像敦煌那样形成具备区域特色的文化品牌, 针对这一现状, 张迪提出了“景观叙事是伏羲文化资源化的重要实现途径”[8], 这种途径的目的在于对伏羲文化资源的延伸。“活化乡土文化资源”[9]是进行乡村文化振兴的首要因素, 也是应该首先开展的乡村文化建设活动, 在未来一段时期天水市的相关治理主体应该继续盘活乡村文化资源, 做好文化振兴的奠基工程。

2、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产品

天水市乡村建设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独特的乡村空间, 承载人们的文化乡愁, 关键的环节就是开发具有智慧性和创造性的文化产品。在文化产品的开发上, 应该把着力点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的开发上, 诸如雕漆技艺、地毯织造技艺, 这些非遗可以开发成独居匠心的特色文化产品, 也就是“内容为王, 创意制胜”[10]的文化产品, 形成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品牌。

3、聚焦文化产业, 实现规模效应

“以乡村文化为底色的产业发展可以有效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11]。在文化产品开发的基础上, 实现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 进而需要实现文化产业的规模效应, 带动天水市乡村的整体发展。

(二) 文化认同下的主体回流

1、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实现文化产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天水市各县区的经济发展, 只有当地的文化产业发展起来, 才能带动天水市乡村的劳动力在当地进行转移, 从而实现区域长远的发展, 这需要各县区结合自身文化资源进行产品创新, 立足于天水市乡村的本土特色, 从旅游业进行导入, 振兴县域经济, 实现天水市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的复归。

2、构建多元主体驱动体系

天水市政府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是重要的治理主体, 乡村精英是乡村中有影响的能工巧匠、教师和有文化的乡贤等, 这些人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有独特的作用, “新农人”是主体意识觉醒的新时代农民, 非政府组织在天水市的乡村文化建设中起着连接农民和政府的中介作用。政府合理决策施加影响, 但是其主导的地位需要得到明确, 而乡村精英和“新农人”作为主体需要参与到天水市的乡村文化建设中, 非政府组织也应更有力地发挥其连接作用, 形成如下图5所示的一个良性循环互动的架构, 振兴天水市乡村文化事业。

(三) 乡村文化载体的盘活

1、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

非政府组织在文化载体的开发上意义独特, 天水市政府应设立相应的政策、资金和人才等扶持机制, 积极引导帮扶非政府组织开发各种鲜活的文化物质载体, 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 鼓励非政府组织扎根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建设融入天水市乡村环境的文化站和农家书屋, 以及开发其它可以充分发挥文化资源特性的物质载体, 让其在现代更具有生命力。

2、形成匹配的监管机制

在进行物质载体建设时, 应充分引导相应主体完成对内容的筛选和转化, 形成对物质载体的监管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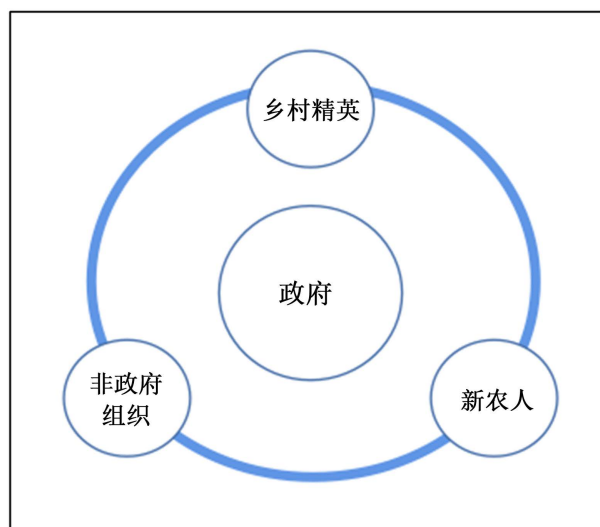


Figure 5. Schematic diagram of relevant subjects in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图 5. 乡村文化建设相关主体示意图

制, 尤其是新媒体介入的相关文化物质载体, 对相应的内容和标准进行严格审核, 将农民作为出发点, 激活农村社会内部的文化资源为目的, 并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及农民情感价值, 传播学研究应该给予高度关注和支持。监管的目的在于体现文化积极的内涵, 让文化载体具备持久的生命力, 让天水市乡村人民的情感价值得到正向的回应。

(四) 乡村文化传播的时空显现

1、体现乡野意象的美好

在短视频的影响下, 天水市部分农民进行了积极的主体建构, 极具代表性的就是活跃于各短视频平台的农民主播, 这些农民主播中有一些进行农产品的销售, 诸如天水花牛苹果、大樱桃和甘谷花椒等, 还有的用自身积极的行动进行文化传播, 不过宣传的大多是麦积山这样的自然遗产或者伏羲祭典这样的民俗文化, 在乡野场景的体现上并不充分, 而城市居民实际偏好那种独特美丽的乡野场景, 例如李子柒用“场景修辞” [12]搭建的乡野田园, 这种体现诗意乡村生活的短视频传播了美好的乡村文化, 给人们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让人们感受到了乡野意象的美好, 带来了良好的情感互动。

2、实现农耕文化的共鸣

传统农耕文明形成的农耕文化是我国乡村文化的核心, 天水市的农耕文化历史悠久, 在进行天水市乡村文化传播时可以通过具有乡野意蕴的场景搭建, 让人们更容易参与到文化的交互活动中, 从视觉以及内心情感上带给人们审美体验, 让人们感受到农耕文明中美好的所在, 实现农耕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交融, 让文化主体在农耕文化中体察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留住乡村, 抚慰乡愁[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双碳”战略背景下西北农牧民环境意识和行为调查研究》(22BKS61)。

参考文献

- [1]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47.
-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3.
- [3] 潘信林, 孙亚军. 文化治理: 理论渊源、概念定位、参照视野与发展展望[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6(5): 71-78.

- [4] 吴理财. 文化治理的三张面孔[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53(1): 58-68.
- [5] 陈建. 发达国家的公共文化治理模式[J]. 图书馆论坛, 2019, 39(12): 151-157.
- [6] 韦祖庆. 空心村乡村文化研究[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 1.
- [7] 沙垚. 乡村文化传播的内生性视角: “文化下乡”的困境与出路[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6, 38(6): 20-24+30.
- [8] 肖莉, 王仕民.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双重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J].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20(2): 57-64.
- [9] 张迪. 伏羲文化的资源化与景观叙事[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1, 13(1): 118-128+156.
- [10] 史云, 孙泽宇, 彭伟秀, 单晓娟. 传统的未来: 乡村文化振兴机制研究[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2(2): 84-92.
- [11] 刘文良, 邵煜涵. “非遗+”文化创意产品创新开发策略研究[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24(5): 67-75.
- [12] 蒋沂霏. 短视频乡村文化传播的视觉修辞呈现——以李子柒短视频为例[J]. 新媒体研究, 2020, 6(17): 96-100.
- [13] 孙军, 徐宁. 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理论篇[M].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 119.